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章太炎



杭州西湖风光秀丽的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翠竹苍柏间有座高耸的墓碑，上面有“章太炎之墓”5个苍劲古朴的大字。这里就是一代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章太炎长眠之所。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因羡慕明末清初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文章道学及为人，故改名号。因顾炎武本名为绛，就改名为绛，自号太炎，字枚叔，又做梅叔。

一、离经叛道求新途

1869年1月12日，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仓前镇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其父章睿，能文善诗，作过知县。章太炎兄弟3人，章太炎排行最末。大哥、二哥都考中了举人，由此走上了仕途。父亲十分希望自己最小的儿子也走上当时的仕宦的正途——科举，因此请章太炎的外祖父——朱有虔从章太炎9岁时就开始教他。朱有虔虽然自己在国学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也是一个根底十分扎实、治学严谨的老学者。他对自己的外孙期望甚高，教导时就格外地用心，前后共用了4年的时间使一个懵懂少年“稍知经训”。之后，外祖父回海盐老家，章睿就亲掌教鞭。章太炎的求知欲十分强烈，他充分利用自己支配的时间广泛地涉猎史传，浏览老庄，而且尤其好读音韵训诂之书，诸如许慎的《说文解字》、顾炎武《音学五书》、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邵懿辰的《尔雅义疏》、阮元的《学海堂经解》等，都是章太炎晨诵夕读的必读书。这为他今后在国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父亲对他学习督促如此之严，当然是希望他也像自己的哥哥一样走上仕途。但章太炎的心性是喜好古文辞，看到八股文就头疼，但那时，只有精通八股才有可能出人头地。迫于父亲和社会的压力，章太炎经过六、七年苦读后，也参加过县的童子试，但在考前却犯了“眩厥”之症，没有考成。自此，章太炎绝意八股。深知儿子秉性的章睿也只好不勉强他了。

随着外祖父及父亲训读十几年，章太炎学的是国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没有迎合社会而随波逐流。而且，这十几年对章太炎更大的收获可能是民族主义思想的滋长。

章太炎的外祖父在与他闲谈时，常提起“夷夏之防”，以及排斥外来民族的“攘夷”等，喜欢思想求解的章太炎凭自己的推论，提出了：“按照这个道理说来，那么明代被清灭亡，反倒不如被李自成起义军灭亡！”外祖父阻止小太炎再说下去，他说：“李自成本人是不好的，但也难保他的子孙都不好，只是目前不能作这样的推论了！”他的这种李自成总比清朝好些的说法，自然使得章太炎感到十分的新鲜。而且章家有个传统，就是死时入殓时绝对不许穿清朝的服饰，而必须身着汉民族的传统服装。章太炎的父亲临死时就对太炎说：“我虽然作过清朝的官，但我死后也不能违背祖训家教，不能加穿清朝的官服！”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章太炎，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他后来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斗士是不无必然的。

1890年，章太炎23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章太炎料理完丧事后，离开了余杭，来到了杭州，进入诂经精舍深造。由此走向了社会，开始了修身、养性、平天下的漫漫长途。

风光秀旖的西湖北畔座落着一个古老的书院——诂经精舍，这所书院的

创建者是著名的朴学大师阮元，他在编纂完百卷《经籍纂古》之后，就将修书之所改成书院。历来主持书院学政的多是饱学硕儒。当章太炎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朴学大师俞樾在此主政。俞樾学问精审，治学严谨，著述繁复，且极有创见和独到之处。

章太炎来到这里，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受，前后首尾共计7年，专心治学。一改旧日贪多求快、钻研不深的毛病，潜心励志，踏踏实实地追随俞樾探求古文经学的奥妙。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两大学派，前者注重的是探求经书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后者则注重经籍的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当时，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是刘逢禄，章太炎虽然还未出草庐，但他却写下了50万字的巨著来驳斥这位今文经学的大师。虽然现在看来文字比较粗劣，但不盲从、肯思索、敢向权威挑战的求实精神已经显露无遗。

经过了7年潜心励志的苦学，章太炎的学识已经变得淹博精深，而他的思想也由此更加睿智明晰，开始关注书斋外面的世界。

书斋是平静的，但外面的世界早已是风云变幻，事变迭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苦难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消息传来，平静的西子湖也不再平静。章太炎的心更是翻江倒海一般，难以平静。他一向崇拜明末清初的爱国志士，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更是刻骨铭心，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现在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他岂能坐视！正好，这时传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公车上书”，请求清政府拒签约，迁都西安，加紧练兵，发奋变法以及创办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强学会的消息，深合章太炎的脾胃。他立刻从杭州给上海的强学会寄去了16元的会费，报名加入了强学会。

1896年8月，汪康年、夏曾佑、梁启超等在上海发起创办《时务报》，派人到杭州邀请章太炎来报社一道工作。这个邀请正合正要走出书斋，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番的章太炎的心意。他立刻到老师俞樾处欲辞别而去。

俞樾一向不过问外界的变化，虽然西学日盛，但他仍一心要求自己的弟子们专心于儒家的经典，究其终始。章太炎是他最为得意的学生，而今却要抛下学业，他当然是不赞成的，因此他极力阻止章太炎去上海。

授业之恩、师生之谊当然也在章太炎的心中激起涟漪，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哪里比得上救国图存这个大业的重要啊！

1897年春天，章太炎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年逾古稀的恩师以及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离开了求学7年之久诂经学舍，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南部中国的变法的中心——上海。由此开始了以笔为枪的斗争生涯。

二、苍茫求索图破壁

章太炎来到了时务报馆之后，立即投入了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先后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章。这些文章除了当时维新派所一直提倡的兴学会、开民智等主张以外，比较突出的是注意到了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这两篇文章行文瑰丽闳雅，但比之梁启超之类的清新流畅的文章却尤其显得古奥难懂，可以说是古雅艰涩有余，但通俗流畅不足。这样“文必法古”的文章显然与流通于市井的报馆文体例差

异甚大，外界对于章太炎的文章也就毁誉参半。但“文必法古”是章太炎终生引以为自矜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文笔的一个大的缺憾。

在时务报馆与康有为的弟子们在一起共事，虽然总的说来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但章太炎与康门弟子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别。

康有为基本上可以归属于今文经学派，其宣扬的思想概括起来是托古改制，即打着孔子的旗号，实际上宣扬变法思想。这种做法在当时孔子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比较容易被一般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但是若从学术方面而言，康有为的主要著作，诸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其论证的方法多为牵强附会，甚至荒诞不经、极端荒谬。

康有为的这种做法对于像章太炎这样国学根底厚实的知识分子而言，是难以接受的。章太炎所宗的是古文经学，自然对于康门的这种支离破碎的比附之学十分鄙视，专门写了驳议数十条，驳斥康有为的得意之作《新学伪经考》，这自然就与康门弟子们冲突起来。康门弟子神化孔子，而章太炎却“甚非之”；康门弟子对于康有为的吹捧简直是上了天，说什么南海圣人，孔教教主等等，而章太炎则直斥之为狂悖放肆，如同一群屎壳螂在推滚粪球。

如此而来，分歧与隔阂与日俱增，康门弟子对于章太炎的公开辱骂康党之流的话更是如鲠在喉，忌恨不已。终于有一天，康门弟子群集时务报馆，对章太炎大打出手，章太炎自然不甘示弱，奋起还击，还打了梁启超一记耳光。但群殴之下，自然是章太炎吃了亏，但他仍不输口，嘲笑康门弟子说：“康有为了你们这些学生，莫非就像当年孔子有了子路作保镖一样，从此恶声不入于耳吗？”

思想上的分歧，竟导致遭受皮肉之苦，章太炎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回到了杭州。几个月内，既编辑《经世报》，又为《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撰写了十余篇稿子，阐述自己对于先秦诸子的看法，宣扬变法维新的主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变法箴言》，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批评了当时变法主张中的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华妙”，即沉湎于佛学中，逃避斗争；二是“猝暴”，即热衷西方制度，急躁冒进。章太炎预言：“病华妙者，吾惧其不以身殉也；病猝暴者，吾又惧其妄以身殉也。”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在变法维新日趋高涨时，头脑仍是比较清醒的。

1897年11月，以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为契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都虎视眈眈，伺机效尤。中国面临瓜分的危险更加迫切了。

章太炎对于腐朽的清政府早已不抱希望了，但他对于清王朝的那些掌握地方实力的汉人督抚还抱有一丝希望，以为这些炎黄子孙还能有些赤子心肠。因此，章太炎满怀希望地给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联日抗俄之类的以同种抗异种的建议，希望李鸿章能“旋转逆流”。但这封信如沉海之石，杳无音讯。

这时，正好湖广总督张之洞派人来聘请章太炎到武昌帮助筹办《正学报》，章太炎想依靠汉人督抚来改变现状的念头正盛，遂欣然应命前往。

张之洞与当时的一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不同，他虽然也反对变法，但却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手法——以变反变，即表面上顺应时流，也谈“变通陈法”，而在骨子里反对。其典型代表就是他组织一班文人编写的、系统论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劝学篇》。章太炎来到后，张之洞十分热情地接待，并拿出刚刚脱稿的《劝学篇》请章太炎来润色加工。不料，章太炎对于书中的核心——内篇竟不置一词，反而对强调“西学为用”的外篇比较青睐，

认为最合时宜。对此，张之洞颇为不快。

实际上，章太炎对于《劝学篇》内篇中大肆宣传“忠爱”、“忠君”不置一词，已经是十分地客气了，碍于第一次见面，不好太让主人下不了台。若依他平时的脾气，早就大加批驳了。他私下里对一个叫朱强甫的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根本没有理由让人们忠君，更何况满清蹂躏汉族已经近300年了，早已无忠可言。而要“忠爱”，那要等待革命以后才可以。《春秋》是主张“国弑君”的，国君如果太坏，国民可以将他杀掉。言谈话语中，还十分藐视地直呼满清皇帝的名讳。朱强甫反问章太炎说：“你的祖宗不也有人作过清朝的官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章太炎直言不讳地说：“那是为强暴所污，不得以而为之！”

朱强甫是梁鼎芬的弟子，他们师徒正以宣扬忠君的思想而深得张之洞的赏识，章太炎的这番无法无天的革命言论令他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立刻到张之洞那里去告密。张之洞立刻派人来质问，章太炎不仅不加掩饰，反而引经据典地一一加以反驳。

有一次，梁鼎芬与章太炎闲谈时提起康有为，梁鼎芬说：“听说康有为想做皇帝，有这么回事吗？”章太炎不经意地说道：“没听说这回事，只听说他想做教主。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怪，要想做教主，就有点想入非非了。”“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怪”这句话，章太炎虽是漫不经心地说出，但听在梁鼎芬的耳朵里，不尤如晴空中打了个霹雳，他立刻跑到张之洞那里说章太炎心术不正，有欺君犯上之嫌，不宜重用。

张之洞派人去请章太炎本来就是借他的学术名气，并非是真心想变法维新，听到章太炎这样放荡不羁，生怕章太炎的狂言为自己惹来祸端，使得自己投机不成，反蚀一把米。就派人将章太炎驱逐出境。据说，章太炎离境时，还被梁鼎芬派人毒打了一顿，盘缠也被劫掠一空。

离开诂经精学舍的这段时光，时务报馆不欢而散。上书李鸿章石沉大海，倚靠张之洞又是强遭驱逐，章太炎的心中泛起阵阵凄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他在离鄂返沪的路上，写了一首《艾如张》，其中结尾一句为“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预言在时代更替的大动荡的时期，一定会有陈胜、吴广那样的造反志士出现的。

章太炎返沪不久，戊戌变法开始了。一时间全国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的兴旺局面，很多人愁眉顿展，以为富国强兵指日可待。但章太炎却清醒地意识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一定会加以阻挠，变法很难取得成功。不幸的是戊戌变法正如章太炎所料，只经过了短短的103天就夭折了。顽固派不仅囚禁了光绪皇帝，而且捕杀了谭嗣同、刘光第等“戊戌维新六君子”，废除了一切新政，并大肆搜捕主张变法维新的人士。章太炎由于列名强学会，也在通缉名单之内，被迫到当时被日本强占的台湾避难。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章太炎对于改良主义的道路产生了怀疑，在他写下的一首《杂感》中，他借用周武王伐纣的典故，喊出了“何不诵《大明》，为君陈亥午”的呼声。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章太炎的思想还没有超出改良主义的藩篱。

章太炎在台湾期间主要是为当时台湾最大的一家报纸《台湾日日新报》编撰中文版，发表了不少的文字。这些文字仍然是艰深冷僻，十分难解。报社主笔木下新三郎曾问他：“先生所写的文字是自解自读的，还是供一般人共读而都解的呢？”章太炎没有吭声，只是提起了笔，在纸上写到：“世人

之知不知，解不解，我可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木下新三郎见他如此执拗，也只有叹息而已。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的日子也没有待长，这倒不是由于他的文字的艰深，而是他时常攻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治台政策，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开始，由于章太炎攻击的语言还算和缓，当局就没有深究。后来，章太炎又撰文抨击“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多作威作福，压制人民”，这篇文章由于主编的疏忽而得以刊登出来，人心大快。台湾总督将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卫找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社长一肚子怨气回到报社，立刻派人去叫章太炎。章太炎不理不睬，只写了张纸条：“何不唤守屋来？他不知土前为慕土，王前为趋势乎？”守屋善兵卫难以忍受，亲自跑到章太炎的寓所，咆哮怒骂了一通，并下了逐客令。章太炎待守屋善兵卫走后，平静地说：“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收拾行装准备离去。正好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清议报》来函邀请章太炎到日本去，章太炎遂于1899年6月离开了台湾前往日本。

这次到日本是章太炎首次到日本，一切都是新鲜的，也大大开阔了章太炎的眼界。这次在日本，多次与梁启超促膝谈心，消除了旧日的隔阂，改善了两人的关系。尤其是这次认识了孙中山，对于孙中山的革命谈论，叹为“卓识”，只可惜因种种原因两人未能深交。

居日期间，章太炎自然又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菌说》一文。这是一篇矛头直接针对谭嗣同《仁说》的重要论文。《仁说》是谭嗣同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代表了戊戌变法时期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和儒教的三纲五常观念的最高水平，但这本书中最大的缺陷是内容庞杂，虽然有一些唯物主义的词句，但其主体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东西。由于《清议报》以及上海的《亚东时报》自1899年1月开始，都连续刊载《仁说》，在思想界引起极大的反响。章太炎觉得有必要撰文加以驳斥，遂有《菌说》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对于谭嗣同的唯心主义体系展开批判的第一文，也是反映章太炎唯物论和进化论观点的重要代表作。

停居日本3个月之后，章太炎觉得国内因政变引起的风波渐渐平息，遂悄悄地返回到了上海，后参加了《亚东时报》的编辑工作，结识了唐才常，还被卷入了经元善等人发起的反对慈禧太后废黜光绪皇帝，立溥隲为大阿哥的请愿斗争。这次请愿又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章太炎虽然被通缉，但由于他不是为首者，且身处于上海租界，从而幸免于难。说来，这次联名通电上的章太炎的签名，并非是他自己所署，而是他人妄自代署。当受到通缉时，有人劝章太炎写信向正在得势的梁鼎芬解释求援。但章太炎义正辞严地说：“我虽然是被人妄自代署，但事已如此，我纵使杀身殒命，也决不向梁鼎芬之流乞援。”

三、分道扬镳割辫发

1899年9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途中曾写了一首《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总结了自己离开诘精舍3年以来的思想。诗中斥斥坠落为保皇派的康有为新党与顽固派旧党是一丘之貉，所谓有“蜣螂(qi ng láng 一种昆虫)思转丸，茅鴟(ch)唯啖肉。新耶复旧耶，等此一丘貉。”并批评改良派目光短浅，救不了中国，决心从事反清革命以救中国。诗中云：

仕宦为金吾，肃王志胡蹙。

江海此分袂，涕流如雨霏。

何以赠君子？舌噤不敢告。

弓月保东海，鼯（fén，鼠的一种）冒起南岳。

1900年，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章太炎深受鼓舞，他的思想也开始有了一个新的飞跃——由改良到革命。这个转变的关键（liè，扭转）点就是与唐才常的决裂。

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为同乡，号称“浏阳二杰”。他与谭嗣同志趣相同，积极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认识了康有为，自请为私淑弟子。1899春来到上海，在《亚东时报》参加报馆工作。他以办报为掩护，暗中筹划军事活动，组织了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受康有为的操纵，其宗旨为以武力来逼迫慈禧太后归位给光绪皇帝，而再依靠光绪皇帝进行变法维新。

1900年，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八国联军武装干涉，进攻北京，清政府被迫宣战。但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拒绝执行对外宣战的谕旨，实行所谓的“东南互保”。唐才常认为有机可乘，遂于7月26日邀集上海名流80多人，在“愚园”召开所谓的“中国议会”。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任总干事，会后发表了宣言。主要的宗旨是创立新自立国，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请光绪复辟等。显然，这个宣言本身就态度暧昧，自相矛盾。章太炎当场就表示反对，竭力劝说唐才常：“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要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矛盾，决无成事之理。”但唐才常固执己见，章太炎遂当即声明退出这个组织。回去以后，正好一位朋友带有西式衣帽，章太炎遂愤然剪去了拖在脑后的长辫子，脱去了清朝服装，换上了西装。

您现在看来剪辫子换服装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在清朝这可是一件实在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

汉族本来没有剃发留辫子的习惯，而是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所损，因此将头发都蓄留起来，盘在头上，再戴上帽子，称“束发”。但清兵入关以后，强迫汉人遵从满族的习俗，剃发留辫，即将四周的头发都剃光，只留头顶上的一小撮，编成辫子，垂在脑后。不遵命者，格杀勿论。因此，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剃发留辫就是臣服的表示，而蓄发去辫，是一种反抗清政府统治的标志。太平天国就是以剪辫蓄发而被清政府称之为“发逆”，其原因就在此。

章太炎的举动并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近3年时间的探索，对于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望、决心改弦易辙、与之决裂而开始从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特意为此写了一篇《解辫发》。因此，可以说，章太炎的剪辫易服是他与改良派决裂的标志，也是他踏上反清革命道路的标志。

唐才常在上海“中国议会”结束之后，就潜往汉口，亲自组织自立军，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但很快就因机密泄漏而被捕入狱，次日即被杀害。清政府紧接着下令搜捕有关人员。章太炎虽然因不同意“中国议会”的《宣言》而公开表示退出这个组织，但他的名字仍然被列入被搜捕的黑名单之上。为了躲避风头，章太炎悄悄地回到家乡过年。

1899年初在台湾时，章太炎曾将自己的一些论学论政的文字辑订成册，命名为《榘书》。“榘（qiú）”的意思是“急迫之言”。全书共计50篇，首《尊荀》，终《独圣》。这次回到家，《榘书》初刻已经印出，章太炎细加

校订。由于思想上的变化，使得他对于当初比较满意的一些文字已经变得无法忍受，遂开始大加删订。诸如《客帝》是他早年比较自慰的一篇，主张以孔子的世胄为中国的共主，而满清可以作中国的客帝。但这篇鼓吹改良主义的文字现在看来当然已经不满意了。为此，他在这篇文字前写了一个眉批，自谓“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颖，著之以自劾录，当弃世。”不久，又写了《客帝匡谬》，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还有《分镇》一文也是他早年的一篇重要论文，主体思想是想依靠几个地方督抚的分镇而治，希望既不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又改变现状。现在他对于这种思想也加以批挞，写了《分镇匡谬》一文。到了两年以后，章太炎的思想更加激进，因此在他再次修订《馗书》时，干脆将《客帝》及《分镇》两文删掉，而以《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取而代之，并列之与全书的前录。在某种意义上说，《馗书》一书的修订编排，堪称是章太炎思想的晴雨表。

1901年初春，章太炎又来到了上海。经好友吴君遂的推荐，章太炎来到了美国基督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担任中文教习。

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章太炎曾专程去探视恩师俞樾。本来阔别多年的高徒来看望，应是十分亲热的，但一向温文尔雅的俞樾竟劈头盖脸地痛骂一顿章太炎，说他不忠、不孝，简直“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虽然对自己的恩师十分尊敬，但对于涉及大事大非的问题也不能含糊。他当即对俞樾的指斥加以反驳，并写了《谢本师》公开声明与俞樾断绝师生之谊。可以说，章太炎此时的思想状况已经是站在时代的前沿，即便是恩师出面，也阻挡不了。

思想上的分道扬镳，必然导致行动上的针锋相对。

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积弱溯源论》，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但他的结论却是中国由于“积弱”和民智未开，只能实行比较和平的君主立宪，而决不能采取革命这样的激烈行动。这篇文章在甚为流行的《清议报》上发表，影响了社会上很大一批人。有鉴于此，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教书之余，特意撰写了《正仇满论》，点名道姓地逐条驳斥梁启超，指出目前不革命就没有一点出路，并且深刻地分析了光绪皇帝所谓“圣明”的实质不过是欲借变法这面大旗，来保住自己的权位而已。

《正仇满论》是章太炎与改良派决裂之后的第一篇阐述革命思想的重要文章，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公开对阵的第一篇政论文，由此其影响于后世是十分深远的。

章太炎这个人有些特别，他博学多识，事业心极强，讲起课来是滔滔不绝，上下纵横几千年，记忆力是惊人的好。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个丢三落四、性格古怪的人，有时连回家的路都不识得，平时又不修边幅，发长数寸也不知理。在东吴大学时，有个姓竺的同事每到月末就提醒章太炎应该去理发了，甚至替他垫付理发费，但这样一位同事，章太炎竟见面不知其人姓氏名谁，你说奇怪不！

章太炎可以忘记回家的路，可以忘记熟悉人的姓氏，但他绝对不会忘记的是宣传革命。他在课堂上经常讲的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事迹，向学生灌输的是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有一次，他给学生出了一个作文题——《李自成胡林翼论》，将当时视作逆贼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与清王朝的中兴名臣来进行比较，可算作耸人听闻，当时听说的人无不怪异。自然引起舆论大哗，轰动了整个学校。消息传到了江苏巡抚衙门，以至于江苏巡抚恩寿派人到学

校找美国传教士交涉，要求逮捕煽动学生作乱的乱党章某。恰巧，章太炎正好已经回家过年了，躲过了一场劫难。他的朋友吴君遂特意赶到章太炎的家乡，通风报信。章太炎只得再次收拾行装，于1902年正月，东渡日本避难。

这次东渡日本，形势与章太炎第一次到日本大不一样。到日本留学的热血青年的数量急剧增多，而且章太炎的结识和活动范围扩大了，他的声望也大大地提高了，相应的，他的影响范围也扩大了。

孙中山为章太炎的到来，特意集合了兴中会的同志，在中和堂为他举行了会党内部结盟形式的欢迎会，与章太炎正式定交。革命的同志欢聚一堂，自然是开怀畅饮。章太炎本来就是海量，如今面对知己好友，更是千杯不觉醉，来者不拒。此后，章太炎与孙中山经常互访，相互切磋，讨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赋税、土地以及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十分的契合。这些讨论后来就被记载在《榷书》之中。

4月26日，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身死的日子。章太炎与秦力山等十余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发起了“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借助这种纪念明朝亡国的形式来激起人们对于清王朝的仇恨，宗旨十分明确，那就是反抗清王朝的统治。章太炎饱蘸民族主义情感，亲自撰写了大会宣言。纪念仪式准备在崇祯自缢日——4月26日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

清驻日公使闻讯十分惊恐，急忙找到日本外务省，请求制止。日本政府应其所请，特令警视总监取消此会。东京地方警署奉警视总监之命，将章太炎等发起人召集到警署，武断地宣布取消此次大会。虽然章太炎等据理力争，但最终无济于事。到了预定召开大会的这一天，数百名留日学生由于未能得到通知，按时来到了上野公园，但都被密布的警察劝散。在孙中山的提议下，当天下午，约60余人在横滨永乐酒楼补行了纪念仪式。在会后举行的公宴上，章太炎又是开怀畅饮，来者不拒，但这次不知为何，素来海量的章太炎竟醉得一塌糊涂。

四、奋袂叱咤笔为枪

在日本3个月后，章太炎又回到了国内。他谢绝了各种邀请，径直回到了家乡，准备写一部60万字左右的《中国通史》。但他僻居乡里的这段时间，实际上并没有写什么《中国通史》，而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修改《榷书》。

前面已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说，《榷书》一书的修订编排，堪称是章太炎思想的晴雨表。”《榷书》在章太炎的一生中曾多次修订，而其中最具有影、最具有革命色彩的版本就是这次僻居乡里所修订的。

这次实际上是章太炎第二次修订《榷书》，较之1900年初刻本，这次篇目由原来的50篇增至63篇，首尾篇都有所变动，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大段地删掉了改良主义色彩的文章，而加上许多革命倾向比较明显的文字。

总的说来，这部《榷书》虽然是一部论文集，但可分为4个部分，即前13篇可称得上是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次17篇是哲学论文集，再次25篇为典章制度篇，后8篇为史书编著及人物评价。这部论文集最为典型的特色就是其浓烈的反对满清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而且文章的论述充满了唯物主义思想和进化论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宣传革命的论著，是投向满清和帝国主义的一把匕首。后来在章太炎坐牢时，他的

一条主要的罪状就是作《虐书》，由此可见《虐书》的革命效果。

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虐书》的文字艰深玄奥，生冷怪僻之字满篇皆是，且一句数个典故，令人看后十分难解。其深奥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吧，鲁迅是人人皆知的大文豪，并且还是章太炎的学生，但即便博学如鲁迅，对于章太炎的《虐书》也是蹙眉不已，认为读不懂，甚至于到底应该怎样句逗都弄不清，此书的艰深由此可见一斑。文字总是要让人读的，尤其是宣传文字，不让人读懂，或者说，不让人很轻易地读懂，其社会影响的实际效果自然受到影响。据当时人回忆，《虐书》出版后，销路很不好，就是明证。章太炎的博雅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每到提及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几分遗憾！章太炎的斗士之笔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1903年春，章太炎受蔡元培的邀请，来到上海，到蔡元培创办的学校——爱国学社担任国文教员。

爱国学社是一所新型学校，充满了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洋溢着时代的新气息。在上课之余，每周都在张园举办一次时事讲演会，章太炎自然是其中一位极为重要的讲演家，不可或缺。每当章太炎演讲，都是大声疾呼革命，下面便是如潮般的掌声。

章太炎激烈地鼓吹革命，对于那些激进的革命青年自然也是倍加爱护和喜欢，尤其是对邹容、章士钊、张继这几位少年英豪，更是情投意合。这4位经常在一起相聚畅谈，情意相投，后来在章太炎的提议下，结为了异性兄弟。其中章太炎年纪最大，邹容年纪最小，而且这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了接近20岁，却是最为相得，邹容曾戏称章太炎为“东帝”，自称为“西帝”。

邹容早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动手写《革命军》一书，到上海后写成。全书虽然只有2万字，但文字通俗易懂，极具感召力。书中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气息，称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怒斥清朝列帝为“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指出当时的清朝已经成为了列强的奴隶，而汉人则沦为奴隶的奴隶。必须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全书如犀利出鞘的钢刀，将满清封建的统治剥得体无完肤，以其饱蘸（zhàn，把东西浸入水中，引申为以液体沾染他物）热情的笔喊出了“中华共和国万岁”的时代最强音！

邹容将刚脱稿的《革命军》送给尊敬的老大哥章太炎，请他过目并润色加工。章太炎仔细读过，被书中迸发的革命激情所深深感动，主动提笔为此书作序。序文中，章太炎充分肯定了《革命军》写作的特点，即言辞激烈，慷慨激昂，通俗易懂，是回响在昏昧世界中的振聋发聩的雷霆。读了这本书，哪怕是再糊涂的人，也会悔悟觉醒。如果以《革命军》作为反清革命的“先声”，必然会收到万众一心的动员效果，尤其是此书是如此的通俗，对于那些没有文化的粗人，更能收到其它著作无可比拟的启蒙教育作用。

1903年，《革命军》印成了单印本，并在倾向革命的《苏报》上连续发表了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的推荐文章，称之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革命军》迅速地在上海不胫而走，广泛流行。

章太炎为《革命军》做了序言，积极推荐这样一本令人读后“拔剑起舞，发冲眉竖”的好书籍的同时，他本人也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以他那支沉雄博雅的巨笔，搅起了革命群众心中的浪潮，扫除保皇派的蛊惑的余毒，再度掀起了革命的汹涌。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绝大多数的人都由此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帝

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尤其是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无耻地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更是暴露了其真实面目，唤起了人民群众，使得许多人屏弃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而转向追求革命，整个国内寻求革命的形势空前的高涨。

尤其是那些原来信奉康有为的学说、追随康有为忠心保皇的保皇派内部也产生了分化，甚至于像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徐勤这样的中坚分子也开始动摇，有了一些寻求革命的倾向。南北美洲华侨中的一些保皇会会员写信给康有为，向他述说了忠心保皇却惨遭杀戮的苦衷，并提出了向往革命的想法：“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

面对这样的形势，原来在戊戌变法中曾超过积极作用的康有为竟仍然死抱着光绪不放，坚持走保皇的改良的道路，竭力反对走革命的道路。不仅如此，这位在海内外有着巨大影响的领袖人物还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在1902年，康有为连续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及《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竭力劝说那些已经倾向革命的人回转头，再走回头路。康有为以保皇派的党魁和海内著名文人的双重身份，再加上门徒遍天下，这两封信又写得十分有蛊惑和欺骗性，对当时的革命浪潮起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严重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为此，章太炎义不容辞地与康有为展开了论战，以他那如椽(chuán)的巨笔，写下了著名的惊世之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康有为的信中，首先指出要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与光绪皇帝区分开来，并且分析了后党必将失去政柄、光绪一定复辟，并竭力论述了中国不可实行革命的四大理由，即革命残酷，中国国情特殊，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以及光绪享有天命，足以能变法以强国等。在信中，康有为还闭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满汉早已平等，并大肆攻击革命派反满是“大怪不可解”。最后，康有为得出结论是中国只有实行立宪，绝对不能实行革命。

1903年上半年，章太炎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信中所阐述的，逐条地加以驳斥。

文章开头，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康有为所鼓吹的“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绝非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而是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如此欺骗性的言论出自自称“圣人”及“教主”的海内名士之口，必须加以驳斥。

首先，章太炎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清王朝统治下的满汉矛盾的尖锐，并列举了从清初的“扬州十日”，直到前几年的捕杀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的血淋淋的事实。章太炎直截了当的指出，甚至于你康有为不也亲身遭受清廷迫害而流亡海外吗？如此还说什么满汉已经平等，岂不是昧着良心的反动言论！

其次，章太炎深刻地分析了光绪皇帝之所以能赞成维新，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增加与慈禧抗争的筹码而已。并驳斥了康有为所鼓吹光绪的所谓“圣仁英武”的观点，指出，将来光绪如果一旦上台，也必定是一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

再者，章太炎指出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即使实行所谓的“立宪”，也不能解决民权问题，仍是封建专制的天下。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上院的控制权必然是掌握在满清贵族的手中。

对于革命要流血的问题，章太炎予以了正面的回答。他辩证地分析了立宪与革命的难易问题，指出革命是免不了要流血的，但若实行立宪，必然是流更多的血，而绝非是康有为所说的不流血，那是天真已极的幼稚之言。而

康有为所竭力鼓吹的光绪有天命纯粹是无稽之谈，何况革命是靠人力而非那无稽的天命。推说中国国情特殊而拒绝革命是不明中国历史的谬论，革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学习过程。当然，革命必然要与外国发生冲突，但我们可以利用自己国家的有利方面，与之抗争；而且外国也是势得的很，革命稍有成功，外国也必然要承认中国的现实。

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谬论之后，正告康有为：20余年来，你围绕着“富贵利禄”，经常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你的那一套已经蒙混不了人了。如果悬崖勒马，赞助革命，还会造就非凡的功业；否则，必将名实俱失，为天下人所耻笑！

应该指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政论文，精彩至极！它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耀眼光芒，是对已往的革命思想理论的总结和集大成之作，更为今后革命的发展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可以说，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是一篇与邹容的《革命军》相媲美的姊妹篇。

这篇文章，不仅气势磅礴，思维敏捷，条理缜密，观点鲜明，立论坚实，而且旁征博引，时而激昂痛斥，如决泻之大河，奔腾千里；时而娓娓劝说，如潺潺的小溪。文笔之生动犀利，感情之充沛激昂，理论的深邃精深，的确非常人可比！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这篇文章写好之后，章太炎特意着人将它带到香港，要交给康有为，但未能如愿。1903年6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同时付梓刊行，不到一个月，就被抢购一空。当月，《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录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更是扩大了此文的影响范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篇文章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而非如《诰书》一样滞销，固然有此文极其鲜明的针对性及深邃深刻的革命理论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篇文章的写作风格有所突破。

与章太炎历来的风格，诸如《诰书》等文字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散文，一反其玄奥难懂、生冷怪僻的文风。这可以说是章太炎的一次突破，更是一次辉煌。柳亚子曾称赞章太炎：“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将章太炎比做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玛志尼，这个比拟一点都不过分。此时的章太炎的确用他手中的如椽巨笔，奋袂攘臂，叱咤风云，横扫浮云，将沉睡的中国唤醒。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发表，如重磅炮弹一般，轰得改良派的阵营大大分化与动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章太炎的这篇文章对于那些向来不接受和反对革命的封建士大夫的震动尤其巨大。这里有当年同盟会的会员汪东的一段回忆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章太炎文章的巨大影响力及实际宣传效果：

尤其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80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多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它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地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责备，谁知祖父却笑着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汪东《同

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为宣传革命的代表之作，但他们是代表了不同的针对面的。邹容的《革命军》以其通俗易懂更易为大众所接受，而章太炎以其深厚的功底和深邃的哲理，而对那些比较顽固的分子有着更强烈的说服力，这是《革命军》一书所无法企及的。

五、身陷囹圄笑顽虏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章太炎赢得了空前的声誉，但也为他带来了囹圄之苦。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要唤醒沉睡的民众，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是难以办到的。章太炎正是这样。他的文章唤醒了民众，掀起了革命的新高潮，但他本人却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狱。

事情的始末还得从《苏报》谈起。

《苏报》本是一家刊载市井俚俗杂事的极不起眼的小报。1896年，湖南人陈范出资买下了这家报纸。陈范本是一知县，因教案而丢官，“愤官场之腐败，思清议救天下”。由于抱着这样的办报宗旨，使得他的思想倾向逐渐由改良维新转向革命。尤其是1902年以后，《苏报》与爱国学社达成了协议，由爱国学社的教员轮流给《苏报》写稿，这样，《苏报》就成为了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一个主要的阵地。自然，《苏报》的思想倾向就深受爱国学社的影响而日趋革命。尤其是1903年5月以后，陆续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章太炎和章士钊推荐和介绍《革命军》的文章，以及摘要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时间，报纸的版面上充斥了“革命”、“民主”、“排满”等醒目的字眼，掀起了一个宣传革命的高潮。

《苏报》的极力鼓吹革命早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随着宣传革命的力度的增强，自然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大的恐慌。由于爱国学社和《苏报》馆皆属于上海租界范围内，清朝统治者不敢明目张胆地去镇压，而是加紧了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企图通过租界当局来达到逮捕革命派、镇压革命的目的。

6月29日，也就是《苏报》发表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要的当天，清政府的上海道台经过了再三的交涉，终于与上海租界的殖民机构工部局勾结成功，派出了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指名抓陈范、蔡元培、章太炎和邹容等。陈、蔡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早已避开了，正好章太炎与邹容也不在，巡捕和警探只抓走了报馆的帐房。

当晚，有人向章太炎通报巡捕前来抓人的消息，章太炎却一点也不在乎，只说“小事扰扰”，随即就钻进被窝呼呼睡大觉，根本没有一点要避开的打算。

第二天，巡捕和警探又来报馆抓人，邹容闻讯躲到一位传教士家中，正在爱国学社帐房的章太炎不仅不躲开，反而迈着方步迎了上去，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高声说：“别的人都不在！你们要抓的章炳麟，就是我！”对于这样主动送上门来的犯人，巡捕还真是头一回见到，真是喜不自胜，当即拿出手铐，将章太炎套住，立刻带走。连章太炎想带点生活日用品，也被断然拒绝。

章太炎被逮捕后，邹容不愿让老大哥独自承担责任，主动投案。

自章太炎被逮捕后，前后只7天的时间内，苏报馆就有6人被抓，《苏

报》和爱国学社也被查封，财产全部被没收。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章太炎知道巡捕要抓自己，不但不躲，反而要送上门？其动机是什么呀？是不是有点太愚了？实际上这样的疑问当年就有人提出过。在章太炎刚被捕之后，上海《新闻报》有记者登出文章，嘲笑章太炎“不去为愚”。

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自己有过明确的回答。他看过《新闻报》后，当即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狱中答新闻报》，刊登在最后一期《苏报》上。

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坦然地阐述了自己这么做的动机和意图。他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必须实行革命，而“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之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民！”这些字句足以表明，章太炎见难不避，反而主动送上门来，这样做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他已经抱定了牺牲，准备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仍在沉睡的人们。章太炎相信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自己是全国四万万同胞的代表。最后，章太炎极为嘲讽地对《新闻报》的记者说：“斥鹤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他坚定地宣言：“滚开吧！新闻记者。请看50年后，巍巍矗立于云表的铜像到底是我？还是你？坐以待之，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章太炎的举动绝非是什么一时冲动或愚昧，而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行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有着强烈的发聋振聩的作用。

对于章太炎、邹容这样两位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反清志士，满清政府当然是恨之入骨，置之死地而后快。固然，反动的清政府可以不顾一切舆论的压力而将这两人处死，但他们对租界内的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因此清政府在苏报案一发生，立刻千方百计地想将章太炎、邹容两人引渡到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内，一旦成功，就准备“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为了达到杀害革命志士的罪恶目的，满清政府派出了大批人员，绞尽脑汁地大肆活动。为了达到引渡的目的，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甚至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上海和北京，满清政府曾向帝国主义许下了沪宁铁路的特权，白银10万两，这还不包括另外送给巡捕房的酬劳费。目的就是要把章太炎、邹容引渡给清政府。

但是，帝国主义对于引渡章太炎、邹容这两位著名文人还是颇费思量的。为顾及自己的面子，再加上害怕引渡章太炎、邹容之后引起全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最终只得表示：“租界事，应当在租界处理。”拒绝了清政府要求引渡章太炎、邹容的要求。

无奈之下，清政府转而求其次，要求审判章太炎与邹容两人。经过多次交涉，最终达成了协议，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太炎与邹容等人进行审判。

额外公堂自7月15日开始，对章太炎与邹容多次开庭会审。审判员名义上是由公廨谳员孙建臣、上海知县汪懋琨及英国副领事迪比男共同组成，但实际上是操纵在英国副领事迪比男一个之手，其它的两人只不过是陪衬而已。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律师，满清政府出面聘请了西人古柏、哈华托作为己方律师，狱外的革命同志为章太炎与邹容请了西人博易、琼司为辩方律师。

说来也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这样的额外公堂被告自然是章太炎与邹容

两人，但究竟谁是原告，却并非是开始就十分清楚的。因此，被告的律师博易在发问时，首先就抓住这个问题问到底此案的原告是谁，是北京政府呢？还是江苏巡抚？上海道台？要求审判员明确无误地予以答复。一时间，审判员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辩护律师的一再追问下，公廨谳（yàn，审判定案）员孙建臣只得窘困地承认，他是奉满清政府的指令担任原告的。孙建臣说：“章太炎与邹容是江苏巡抚奉上谕饬令拘拿的，我作为分府只有遵奉上宪札谕来行事。”并且当堂出示了满清政府的札文。

这样，明确了原告与被告双方，即以章太炎与邹容为被告、满清政府为原告，双方皆聘请西方人为律师，而且最后由外国人裁定的特殊现象，这种内容和形式的打官司可以说是千古怪事，怪就怪在一个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之上，竟然要由外国人来裁定政府与私人的官司，岂非是咄咄怪事！当然，这事我们现在看来是怪事，但在当时却是平常得很，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惯常于产生这样的特产！这样的千古怪事！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更是清政府自打耳光的绝妙之作！

在这样的官司中，章太炎与邹容大义凛然地与满清政府及支持它的帝国主义展开了顽强、坚决的斗争。

审判一开始，古柏代表清政府指控邹容的罪名是作《革命军》，极力鼓吹推翻现代国家政权，图谋不轨；指控章太炎的罪名是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而且自己又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诋毁当今圣上，呼为小丑，犯上作乱。章太炎与邹容从容不迫地进行了辩驳，并且借机大肆宣传反清爱国的革命宣传，令审判员哭笑不得。

全国人民广泛地关注着这场特殊的官司的进展过程。章太炎与邹容坚决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颂，当时就有记载说：

章太炎与邹容见危授命，可死而不可屈，可杀而不可辱！

经过多次的法庭会审，案子迟迟没有宣判审判结果，问题当然是出在清政府的方面。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满清政府的代理人多次与额外公堂、英国领事疏通交涉。一直到了当年的12月24日，额外公堂才对外宣布审判结果：

章炳麟作《愬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诬蔑朝廷，行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照律治罪，皆当出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

这个审判结果，自然引起了舆论的大哗，外界纷纷谴责，要求撤消控案。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次年5月额外公堂被迫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2年，并且从上年到案的日子起算，服刑期满后，逐出租界。

审判宣布后，章太炎与邹容被转到了公堂公廨的监牢里，开始了囚徒的生活。当时，革命的志士的勇敢的斗争岂是一堵围墙可以阻止的！章太炎与邹容虽然身陷在监牢中，但革命的斗志反而更加旺盛，他们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参加狱外的革命斗争，并且在狱内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就在章太炎身陷囹圄不久，传来了反清志士沈荇的死讯。沈荇（jìn）长期在京津地区从事秘密的反清活动，这次被捕后竟被活活地鞭打致死。章太炎曾与沈荇有过交往，听到此讯，十分震恻，在深深哀悼同志的同时，想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悲愤交集，写下了《狱中闻沈希禹见杀》诗：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多坟！

诗中不仅表达了对烈士的悲悼之情，更表明了自己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中阴当待我，南北几多坟”的“中阴”是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人死后七七内的阴魂，来指代烈士的英灵。因此，此句的含义就是章太炎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险恶，因此他请求烈士的英灵不要远行，我将与你同行。

上海的爱国志士在8月23日为沈荇举行了追悼大会，章太炎虽然因身陷囹圄而不能亲赴会场，但他秘密撰写了《祭沈希禹文》，托人带到了会场，由章士钊在大会上宣读。“不有死者，谁申民气？不有生者，谁复九州？”这铿锵话语，久久回响在会场上空。

狱外的斗争如火如荼，狱内的斗争也是如此。

公审公廨的监牢地址在提蓝桥，是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重要机构。狱中的狱卒多是英帝国主义从印度招来的，对待囚犯十分残暴，大肆加以虐待。随意殴打囚犯，有时虐待致死也没人来追究，即使是被查出，也不过是罚四五元钱了事而已。他自然也是饱受狱卒虐待，章太炎虽然身材瘦弱，是典型的文弱书生，但他性如烈火，有着惊人的旺盛力量，与狱卒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甚至于绝食7天以示反抗。

在狱中，章太炎与邹容这两位革命的好兄弟，互相扶持，相依为命。在章太炎绝食前，曾与邹容有过一段十分感人的对话：

章：小老弟，你我的身体都十分的虚弱，又不能忍受狱卒的凌辱，与其都被白人迫害致死，还不如早点想个办法，争取保住一人。按照监禁的期限来说，我是3年，你是2年，而且你也比我年轻，所以你当生，我当死！

邹：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大哥如果死了，我也绝不愿再留在世上！

章：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伍子胥兄弟的故事吗？当年楚王要斩草除根，伍子胥的哥哥与自己的父亲共赴刑场，而伍子胥则亡命吴国，最后统率大军杀回楚国，报了父兄之仇。现在我们俩也应该像伍子胥兄弟一样，各得其所，不能一起死掉。你一定要争取活下去，将来报仇雪恨。我采取绝食的手段来逼迫狱方让步。现在外界对于此案的审判议论纷纷，白人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如果我绝食致死，在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狱方必定比较宽待你，这样你就有机会活着出去了。

邹：这绝对不行，尤其是饿死绝不是大丈夫所为着事！

章：中国有名的绝食而死的饿死鬼，第一是殷商末年不食周粟的伯夷，第二是汉代王莽篡权时不肯出仕的龚胜，第三是唐末朱温篡唐建梁时不肯出仕的司空图，第四是元初不肯出仕的抗元志士谢枋得，第五是南明灭亡时绝食而死的刘宗周。要是像前三个不肯出仕汉人政权的人，那是不愿意仿效的；如果像后两人那样，因反对异民族的统治而死，却是我所心甘情愿的。

最后，章太炎还是没有听从邹容的劝说，开始了绝食斗争。当绝食进行到第7天的时候，章太炎原本就十分虚弱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咳就吐血，十分痛苦。这时有个狱友告诉章太炎说：“靠绝食而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的人甚至于需要40多天，你现在才过去了1/6，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不要吃这个苦了。再加上绝食以后，邹容一直在他的旁边劝说他，现在也来反复开导他，最终使得章太炎打消了绝食的念头，重新开始进食。

在狱中的时光，章太炎除了坚持斗争之外，就是阅读佛教典籍。他阅读

了《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这些佛教典籍固然有修身养性，培养涵养功夫的作用，也使得章太炎学到了一些与人辩难的逻辑方法，但也使得他深受其中所贯穿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消极影响，这对他将来思想的转变，使之颓唐当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邹容在狱中却与章太炎不同，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性情十分的暴躁，不堪忍受牢狱的折磨，终于病倒了。这可急坏了章太炎。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医药特长，积极为邹容治疗，同时再三向狱方要求保外就医。但是直到邹容的病情十分险恶的时候，监狱当局才同意这个要求。可是，已经晚了。1905年4月2日，也就是保外就医的头一天晚上，也是邹容的病被拖了两个月之后，邹容服了工部局医生开的药之后，口吐鲜血，不幸离开了他所眷恋的尘世，离开了他未竟的事业，而这距他结束监禁仅仅只有70多天了。

章太炎手抚着邹容已经冰冷的身体，悲痛莫名，泪如泉涌，眼睛看着邹容，张着口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邹容死得蹊跷，死得突然，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关注。人们议论纷纷，都说邹容是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将邹容毒死的，并由此担心章太炎遭遇不测。上海舆论界对租界当局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要求改善章太炎在狱中的待遇，保障他的安全。

租界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同时也担心章太炎真的要有了三长两短，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便同意了要求，相对改善了章太炎的待遇。本来章太炎在狱中是被罚作裁缝的，改派他去为犯人分配饭食，这在狱中是一个美差。这是因为狱中伙食严格定量，但在厨房里的人可以偷食一些，得以补充一些营养。章太炎后来说：“威丹（邹容的字）既歿，白人稍善视余，使任执爨（cuàn，烧火煮饭）之役，因得恣意啖（dàn，吃）食。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章太炎《与篁溪书狱中事》）

1906年6月，章太炎终于熬完了3年的铁窗生活。按照惯例，他被送到了工部局的巡捕房，被限令在3天内离开租界。但章太炎一跨出工部局的大门，立刻掌声四起。原来预先得知章太炎此日出狱的革命同志，诸如蔡元培等，都到工部局的大门口来接他。前来迎接的革命同志与章太炎一一握手相贺之后，章太炎便与孙中山从东京派来专程接他的人，乘日本邮船，第三次东渡日本，又与革命同志们一起开始了新的战斗。

六、主编《民报》旺人神

章太炎一到日本，孙中山就组织同盟会的会员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以接风洗尘。与会者多达2000余人，由于馆小人多，许多人挤在屋檐下或爬在窗台上，以求一睹革命英雄的风采。章太炎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简单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主要是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虽然演讲中对于爱国的提倡，对于孔教的抨击都是十分的精彩，但他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新思想。这可以说是他狱中读书的收获，但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已经成立，且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新的政治纲领之后，倡此论调，颇有不和谐之嫌，而且就其实质而言，也的确是落后了。换言之，章太炎已经从3年前言人所不敢言的时代的最前列的位置掉了下来，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思想落伍的先声。

章太炎一到东京，就已在同盟会会员孙毓筠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并被委任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

此时的《民报》正在承担着与保皇派激烈论战的重要使命。这场论战由保皇派的主要笔杆子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首先发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章太炎主编的《民报》自然站在论战的最前线。

章太炎在此时期内，主要撰写了《讨满洲檄》、《定复仇之是非》、《排满平议》、《中华民国解》等一系列政治论文，深刻地批判了改良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动摇其理论基石。章太炎在这时的论文不仅说理透彻，气势磅礴，而且通畅明白，感染了许多人，使得“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民报》的销售数量激增，而《新民丛报》则大规模减少。对于这段时期的论战，鲁迅先生称之为“令人神旺的战斗”，的确是一点都不夸张。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新民丛报》逐渐招架不住了，只好宣布休战，最后不得不于1907年7月关门停刊，宣告了保皇派的失败。

在主办《民报》期间，章太炎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他以自己在帝国主义监牢里的亲身遭遇和所见所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伪善面目，主张中国要想取得平等和自由，不仅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还要驱逐这些入侵者。

章太炎不仅在《民报》上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同时也付诸了实际行动。1907年4月，章太炎与流亡日本的印度爱国志士钵罗罕一起倡导，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其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去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这个组织虽然实际影响并不大，但却是至今所知亚洲各民族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的最早的尝试。

在《民报》的这段时间，章太炎另外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是积极提倡革命的道德，重视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他指出，现今的革命党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就是顾炎武所提出的“知耻”（懂得廉耻）、“重厚”（朴实庄重）、“耿介”（耿直坦率），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必信”，即一定要说话算数，也就是要忠于革命事业。并且章太炎从历史出发，谆谆告诫革命党人要全力避免结党营私的“朋党”之弊。

对于章太炎的这种努力，当时的很多人开始不理解，后来则深赞章太炎的远见。日后，一些革命党人在回忆时，讲到：

（太炎先生）以富贵利禄为戒，听众耸然，复本其意为《革命道德论》、《箴新党论》二篇，同盟者多奉为圭臬，弥坚其志概。清室以禄利名位招徕游学之士，而民党益锐进不可遏止，是皆先生以其宿学雄文提倡扶持之故也。

《民报》如此积极地宣传反清革命，自然引起满清政府的极大恐慌和仇视。满清政府先是禁止《民报》进入国内，在这个办法失效之后，又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请转告日本政府，要求封禁《民报》。由于日本政府认为应当说服办报的负责人慎重处理有关言论比较稳妥，因此没有立即查封《民报》。对此，清政府又派唐绍仪与日本秘密谈判，许以间岛的领土、抚顺、烟台的煤矿和新法铁路等权利，与日本政府勾结成功。

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正式下达了查封《民报》的命令。作为主办人的章太炎两赴警察署，3次致书日本内务大臣，一次痛

斥说客，为争取《民报》的生存与日本政府积极交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在与日本政府交涉没有成效之后，章太炎便开始公开地揭露日本政府与满清政府相互勾结，查封《民报》的丑恶行径。除了以各种形式向外界公布内情、张贴传单之外，章太炎还向东京地方裁判厅正式起诉。

11月26日，裁判厅正式开庭审问。被告是检事，原告是章太炎。对于被告检事提出的《民报》扰乱社会秩序等一系列罪名，章太炎进行了严正而又无懈可击的辩驳，使得裁判当局无言以对。但是，起诉、审判等不过是日本政府摆摆样子的东西，虽然章太炎的辩论占了上风，但日本政府并不当一回事，不容分辩地宣判了审判结果：禁止《民报》出版，并罚款150元。若不交罚款，罚章太炎做苦役以抵偿。

虽说150元并非是一个大数目，但当时章太炎连一日三餐都保证不了，根本无力交纳罚金。最后被判服苦役150天。就在章太炎被拘留的那一天，他的学生鲁迅、许寿裳等人，多方罗织，凑齐了罚款，将章太炎赎了出来，才使得他免除了这场灾难。

《民报》被封之后，章太炎便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写出了许多学术著作，诸如《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等。其中前两种是探讨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著作，而《国故论衡》则是一部论文集。胡适对此书有极高的评价：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馗书》1914年的修订本）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50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50年，其实我们可以说中国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的功夫很深，又是很富于思想和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七、渐入颓唐保晚节

章太炎主办《民报》以来，其与孙中山思想上的分歧日益明显，渐成裂痕。本来，其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章太炎对于孙中山是十分敬重的，尊称孙中山总统，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革命统帅。但好景不长，章太炎到了东京不到1年，就与孙中山闹翻了，起因就在于办《民报》的经费问题。随着事情的逐渐闹大，两人的裂痕日渐加深，以至于达到了在报上互相攻击的地步。

1909年，章太炎与原光复会的领导人、后加入同盟会的陶成章一起，重新打起了光复会的旗号，由章、陶分任正副会长，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宣告了清王朝政权末日的来临。章太炎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回到了阔别5年的上海。上海的舆论界对他期望甚高，称之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而章太炎本人也颇以革命文豪而自矜。

但是，章太炎在抵达上海后发表的言论中，有不少是对革命不利的，尤其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影响最坏。

章太炎之所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是有他的思考的。还在日本的时候，章太炎就耳闻到欧美国家资产阶级政党争权夺利的弊端，再加上目睹同盟会内部山头间的勾心斗角，所以认为革命成功之后，就不应有政党的存在。在他

提出这个口号之后，旧官僚、立宪派都纷纷借此向孙中山施加压力，要求他销去党名，实际上就是要孙中山拱手让出革命果实，解除武装。这一点尤其反映了章太炎身上革命的不彻底性。

章太炎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也的确是这么去做的。他卷起了光复会的旗帜，脱离了同盟会，与一些封建官僚、立宪派混在一起，组织起“华民国联合会”。

更有甚者，由于对于形势认识的不清楚，是非不辨，使得他的笔锋，一个旧日令改良派、封建卫道士、帝国主义心惊胆战的笔，竟然对准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头上，而对于真正的国贼——袁世凯却是赞誉有加。虽然从主观上而言，章太炎反对孙中山并非是为了个人私事，赞誉袁世凯也是因为错误地将他当做华盛顿之类的人物，而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但就客观方面说来，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几年内的言论和行动，是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助长了袁世凯的气焰。可以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在他的革命生涯上抹了一个黑道。后来，章太炎深刻地反省了这段弯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自认有罪。1916年，章太炎在《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中反省到：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之所以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不只是“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有罪焉！”

后来，章太炎逐渐认识到了袁世凯的真面目，1912年底，借出任东三省筹边使的机会，离开了北平。次年发生了宋教仁遇刺案，使得章太炎更加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立刻南返上海，亲自参加了宋教仁的葬礼，并手撰哀辞。

这时，章太炎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认为只有黎元洪的名望和实力可以和袁世凯抗衡，遂于当年5月来到了武昌，劝说黎元洪竞选总统，与袁世凯对抗。胆小的黎元洪不敢答应，反而诳骗章太炎到北平去看看动静。若劝动袁世凯则万事皆好，不行他再进京竞选总统。章太炎听信了黎元洪，亲自冒险入京。

这次入京后，章太炎察知袁世凯称帝之心已坚，为避免遭他毒手，在京只短短地停留了7天便匆匆返沪。正式致电袁世凯，辞去了东三省筹边使之职，表示“死生之分，一听尊裁”。这封电文被上海报界披露，贯以《章太炎诛佞之言》的醒目标题。

“二次革命”爆发后，章太炎又以自己的一枝笔投入了反袁的斗争之中。“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公开下令搜捕革命党人。他借口商量党务，电请章太炎入京。章太炎深知袁世凯心狠手辣，但自己又不愿再次流亡海外，又想在党务方面有所作为，以遏制袁世凯，遂决意进京，“挽此危局”。这次入京，就被袁世凯软禁了长达3年之久。

3年期间，章太炎曾被四易囚所，而他本人两番绝食，与袁世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大骂袁贼，有时吃花生米下酒时，就掐去花生米蒂，口中念念有词地说：“杀了袁皇帝头矣！”或者大书“袁贼”两字，再点火烧掉，称之为“袁贼烧死了！”在他几次设法离京未果后，发起“疯”来，大闹总统府。鲁迅先生对这件事曾评价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章太炎才得以获释。他谢绝了黎元洪的挽留，回到了上海。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维护《临时约法》的

护法运动。但护法斗争的失败，使得章太炎对于时事彻底失去了信心，回到家乡，杜门谢客，不问国事。

“五·四”运动以后，章太炎与孙中山彻底分裂，一个接受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继续前进，而章太炎却拉车向后。反对新文化运、中国共产党，尤其反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鲁迅先生对此入木三分地总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之下，富饶美丽的东三省被断送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再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

年逾花甲的章太炎愤怒了，怒斥蒋介石为秦桧一样的卖国贼，主张坚决抗日，尤其是对于学生的爱国宣传深表同情。他也投袂而起，艰难地投身到了救亡图存的抗日浪潮之中。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寓所因病去世，终年69岁。

总结章太炎的一生，虽然有些污点，但从其生涯的总体而言，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从颓唐中走出，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章太炎，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一位博学多识的学术大师，他的历史贡献人们是一定会记得的！

